

方孝岳 罗伟豪编

广韵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廣韻研究

广韵研究

方孝岳 罗伟豪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黎国器
封面设计 方楚娟

广 韵 研 究

方孝岳 罗伟蒙编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 印张 19.9万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306-00091-8

H·4 定价：2.20元

目 录

第一章 《广韵》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	(1)
第一节 《广韵》和汉语历史语音研究·····	(1)
第二节 《广韵》和汉字的历史注音·····	(8)
第三节 《广韵》和普通话的学习·····	(20)
第四节 《广韵》和现代方音的对应关系·····	(23)
第五节 《广韵》在训诂学中的作用·····	(26)
第二章 从《切韵》到《广韵》的内容概况·····	(37)
第一节 《切韵》以前的韵书·····	(37)
第二节 《切韵》·····	(52)
第三节 《切韵》以后各家增字增注本·····	(58)
第四节 《广韵》的成书·····	(66)
第五节 《广韵》的各种版本·····	(80)
第三章 《广韵》的音韵系统·····	(85)
第一节 《广韵》的体例·····	(85)
第二节 《广韵》的调类·····	(89)
第三节 《广韵》的韵类·····	(94)
第四节 关于《广韵》韵母系统的拟音·····	(117)
第五节 《广韵》的声类·····	(131)
第六节 关于《广韵》声母系统的拟音·····	(139)
第四章 《广韵》的音节结构·····	(150)
第五章 《广韵》与等韵·····	(205)
第一节 研究《广韵》必须利用等韵·····	(205)
第二节 《广韵》音系与等韵门法·····	(206)

第六章 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	(231)
第一节 纠正误解·····	(231)
第二节 《切韵》的综合性质·····	(233)
主要参考书目·····	(239)
后记·····	(240)

第一章 《广韵》在汉语语言 学研究中的作用

第一节 《广韵》和汉语历史语音研究

《广韵》是中古时代汉语语音资料总汇。它不但能反映我国隋唐时代的语音面貌，而且是研究上古到中古语音变化的重要依据，要研究汉语语音的历史，首先必须研究《广韵》。

语音一发即逝，古代没有录音工具，无法保存古人活的口音，研究汉语历史语音只能依靠各种书面材料，其中最主要的材料是韵书和韵文。过去研究上古音主要是根据《诗经》押韵归纳先秦时期的韵部系统。例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中的“鸠”、“洲”“逑”押韵，是属于同一韵部。“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其中的“流”、“求”是押韵字，也是属于同一韵部。

先秦古音的韵部是怎样从《诗经》押韵归纳出来的呢？主要方法是押韵字的互相串联。例如《关雎》的“流”“求”二字押韵，而在另一些诗中，如

《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求”又与“休”押韵。

《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流”又与“舟”“忧”“游”押韵。通过以上的押韵字作进一步的串联。如

《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綈，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休”与“球”“旒”“綈”“柔”“优”“遒”押韵。

《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

有何亡？龟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舟”与“游”“求”“救”押韵。

《泉水》：“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忧”与“漕”“悠”“游”押韵。

《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游”与“浮”“滔”“求”押韵。

总上所引，可以把“球”“旒”“綵”“柔”“优”“遘”“游”“救”“漕”“悠”“浮”“滔”与“流”“求”“休”“舟”“忧”“游”串联在一起。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韵部。古音学家把这些字定名为“幽”部。

《诗经》押韵的情况表明，押韵字的分类与汉字谐声偏旁的分类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氓》这首诗的第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之怒，秋以为期。”其中的“蚩”“丝”“谋”“淇”“丘”“期”“媒”押韵，“淇”与“期”，“谋”与“媒”都是谐声字，它们既同一个谐声偏旁，也同属一个韵部。这就是古音学家说的“同谐声者必同部”，谐声字起着补充押韵字串联的作用，按此原则如上所举的《关雎》，“鸠”“洲”“逑”与“流”“求”两组押韵字也可以归入同一韵部。

谐声字与押韵字的作用有不同：《诗经》押韵只能解决划分韵部问题，而谐声字可以兼表声母。所谓谐声字就是带有谐声偏旁来表音的字，如“淇从其声”，“谋从某声”等等，“淇”字“谋”字都叫谐声字。凡同一个声符系统的字，其声母韵母总是相同的，或者是相近的。从“其”得声，可以有“淇”[g‘jə]，有“欺”[k‘jə]；“淇”与“欺”韵母相同，声母相近。从“某”得声，可以有“谋”[mjua]，有“媒”[mue]；“谋”与“媒”声母相同，韵母相近。

与押韵字和谐声字互相配合的材料还有假借字，异文，重文等等。假借字和异文有共同之处，借用一个字来代替另一个字的

叫做假借，一个词在古典文献中有多种写法的称为异文，假借字和异文都应该是读音相同或相近。例如古代诸侯有疾病称“负兹”，《公羊传·桓公十七年》作“负兹”，《史记·鲁世家》《后汉书·隗嚣传》《白虎通·疾病》写作“负子”，《尚书·金縢》写作“丕子”，《礼记·隐义》写作“不兹”。“负子”“丕子”“不兹”是“负兹”的异文，“负”是本字，“丕”“不”是假借字。“兹”是本字，“子”是假借字。异文和正文，假借字和本字的读音一定是相同或相近。

重文是指《说文解字》附在正文下面的异体字。在《说文》中，对于一个字有两种或多种写法的，必然以一种写法为主，而把另外的写法附在下面。例如《说文》“麓”字，古文作“𡵓”，这就是重文。正文的声符为“鹿”、重文的声符为“录”，我们据此可以推测上古“鹿”“录”两字读音相同。又如《说文》“梅”字下面注明：或作“𣎵”，正文的声符“每”与重文的声符“某”两字读音一定相近。

在韵书出现之前，研究上古音可以利用的文字材料主要是以上几种。从现代语音学的观点出发，研究某一时代的语音必须掌握它完整的语音体系，上面所列举的各种材料，在性质上只是研究上古音的一种素材，要经过一番排比归纳之后才能表现出这个音系的大致轮廓，以上各种材料都有它的缺陷。利用《诗经》的押韵字归纳韵部系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韵文中的字，哪些入韵，哪些不入韵，没有明确的标准。宋代朱熹所著《诗集传》在分析押韵字方面就犯有不少错误，例如《召南·行露》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朱熹在“家”字下注：“叶音谷。”“家”本来不是韵脚，却硬说是韵脚。可是在有些该押韵的地方反而不指出它是押韵。例如《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窶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为”与“何”押韵，因为不在句末，朱熹就忽略过去了。第二，入韵的字却不是属于同一个韵部。例如《大

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灵”“营”“成”押韵，都属于耕部，这当然不成问题，但“攻”字是否入韵？这是模棱两可的。如果算是入韵，它是属于东部，为什么能与耕部的字押韵？对于这种情况，清代古音学家称之为“合韵”或“借韵”。所谓合韵，就是邻近的韵互相通押。《诗经》押韵中“合韵”的现象是相当多的，例如《关雎》：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芼”和“乐”相押，“芼”属宵部，而“乐”属药部。《七月》：“四月秀蓂，五月鸣蜩。”“蓂”和“蜩”相押，“蓂”属宵部而“蜩”属幽部。怎样断定它是否“合韵”，如果不参考《广韵》来研究上古韵部，单靠上古韵文本本身是不能解释清楚的。

我们研究汉语历史语音学，向来是拿广韵音系做推论的出发点。我们已经知道广韵音系是非常细密的。这种细密性有其历史来源而不是忽然产生的。我们得承认中古以前汉语音系统已经是很细密的了，不过我们从中古以前资料的本身很难作直接的分析，因为以前这方面的资料本身都很零碎，不曾有过具有音韵学系统的资料足以供我们利用。这种系统有待于我们自己去归纳。我们怎样归纳呢？只有利用《广韵》的系统去归纳。就是说，要就《广韵》的音系来看中古以前到中古的分合演变。其进行方法应该第一步把那些有关以前的古音资料，姑且照着《广韵》的音韵地位，逐个排列出来，然后第二步再检出其中不合于整个广韵音系的地方，把它们区别开来另行归纳，这样逐步深入进行，就可以看出中古以前的音和中古音的分合演变了。如上所举，《诗经》押韵宵部与药部通押的现象比较多但为什么又要把宵药分为不同的韵部呢？这就是根据《广韵》的音韵系统就韵尾的不同而决定的。《广韵》的韵尾可以分为三个大类。第一是开尾韵母（即-O），旧名阴声韵。第二是附有鼻音韵尾的韵母（即-m，-n，-ŋ），旧名阳声韵。第三是附有塞音韵尾的韵母（即-p，-t，-k），旧名入声韵。宵部是属于开尾韵母，药部是属于塞音韵尾的韵母，两者的语音大类是

不同的，所以应该分为两个韵部。宵药合韵的情况比较多，这是因为它们的主要元音相同，因此能够通押。

之部和职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之部是开尾韵母，职部是塞音韵尾，但两部也有通押现象。《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辐”“载”“意”是之职通押。可是从全部诗句分析，职部与之部绝大多数是自成一类单独押韵。例如《氓》第一章，其中“蚩”“丝”“谋”“淇”“丘”“期”“媒”七个押韵字同属之部。《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其中“得”“服”“侧”三个押韵字同属职部。《伐檀》中的押韵字“侧”“辐”“直”“亿”“特”“食”同属职部，《硕鼠》中的押韵字“麦”“德”“国”“直”也纯属职部。以上事实说明根据广韵音系把入声韵和阴声韵区别开来是正确的。研究上古音除了用《诗经》押韵作为基本素材以外，还必须充分依靠《广韵》。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凡是研究上古音的人都拿《切韵》的系统（或称《广韵》，或称《唐韵》）来作出发点，跟上古的韵部作一个比较，顾炎武虽然深叹今音（指《切韵》时代的音）行而古音亡，可是也不能不严谨《广韵》的分韵。”“顾炎武虽然想拿《诗经》三百五篇来作古人的韵书，但是在讨论上古音时仍不得不依据《广韵》。”顾炎武在《音学五书·答李子得书》中说：“故吾之书一循《广韵》之次第而不敢辄更。”宋代学者研究上古音或者是盲目追求叶韵而随便改读音，或者是把古韵极度简单化合并《广韵》作为古韵，顾炎武能离析《唐韵》以求古韵，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明创造。

要掌握上古音完整的语音体系，必须对上古音的声母、韵母、声调等各种音素有准确的了解，但根据诗经押韵整理出来的韵部系统仅仅是押韵的系统而不能说是真正的韵母系统，因为同一个韵部的字并不一定是同一个韵母。比如元代《中原音韵》的十九部和近代北方话的十三辙，主要元音相近的可以押韵，至于

是否有介音那就更加不必拘论。我们认为，上古诗经押韵所归纳出来的韵部实际上相当于中古以后的所谓韵摄，每个韵部都可以按相近的主要元音或不同的介音再细分为若干个真正的韵母。此外，诗经押韵只能考证上古音的韵母大类而不能考察上古音的声母。例如“鵙”“洲”押韵，但这两字的声母是什么，诗经押韵本身缺乏研究的根据。

谐声字、假借字、异文、重文等材料可以提供分析研究声母的一些线索，但毕竟只限于个别的音节结构的异同比较，只能反映个别声类古今变化的范围而不能直接确定某字的具体声母，仍然是要利用《广韵》。例如谐声字：

从“其”得声的字，在《广韵》有之部平声“其”小韵〔g'ɿə〕中的“期旗綦祺蓰其璆基麒祺淇鸚棋碁蓰縻基臻祺祺祺祺祺縵祺璣”，“欺”小韵〔k'ɿə〕中的“嫫顛儼熨傲鵷鎮”，“姬”小韵〔kiə〕中的“棋祺箕萁蓰替其稭基”，之部去声“忌”小韵〔kiə〕中的“碁蓰棋”，又有支部平声“斯”小韵〔siə〕中的“廝嘶淇鶖蜚蕤蕤蘄蘄蘄”等等。声母有许多不同，韵母也有不同。

到底“其”声符的字，在上古是代表什么音呢？诸声字本身不能说明确切的声母和韵母，也不能用今天的某一种方音直接联系上古音，还是要用《广韵》做中间的工具。例如今天北京和广州读上面这些字没有浊音 g'，是不是上古也没有浊音呢？今天的许多方音和上古隔得太远，不容易解决。还是《广韵》和上古最为接近，所以应该利用《广韵》。谐声偏旁不同于后来固定的反切，同谐声偏旁的字不同于《广韵》里面的小韵。因为反切代表一定的音素成分，各不相同。而同一个谐声偏旁可以注不同音素的字，我们无法知道每个谐声字在上古时代的确定不移的原音，只能就《广韵》以观其会通，就《广韵》的音韵分类最小单位来看各种谐声系统所活动的范围，看它所占的音韵大类。例如上面从“其”得声的字，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我们从《广韵》可以看出它们的

声母方面绝大多数是舌根爆发音，清浊都有，但偶然有一个舌尖摩擦音；韵母方面，绝大多数是央元音，又偶然有一个前元音，我们就可以说：从“其”得声的字，从上古到《切韵》是舌根爆发音央元音一类，而声母的发音方法是清浊都有的。各地方音虽有不同，但不离这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内可以自相转变。其他是例外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观其会通而不能确定每个字的原来读音。

谐声字如果专就韵母方面来讲，要通过《广韵》去认识，那就和声母方面还有点不同，不仅要打破《广韵》小韵的范围，甚至还要打破韵部的范围，有时要合并几个韵部或就几个韵部的一部分去认识，而决不是小韵所能限制的了。姑且略举从“之”得声的系统来讲。例如“之”字，“寺”字（之声），“待”字（寺声）等等。它们在《广韵》里面是分布于下列几个韵部：

之部，“之”，止而切（-iə），

志部，“寺”，祥吏切（-iə），

海部，“待”，徒亥切（-ni），

这说明我们如果要认识上古“之”声系统的韵母，只有把这几个韵部合并起来看。它们的主要元音是ə/o的区域，而由于方音的关系，各个具体字音可以游离于这个区域之内而有不同。所以《广韵》所注这几个字的反切并不是一定不移的原音。例如上古文献里就有许多地方把“待”字[d'ni]和“侍”字[ziə]互相替代来用，但主要元音ə/o的区域还是有范围可以理解的。这就是就《广韵》的几个韵部，观其会通来认识上古谐声字的韵母大限而不能拘于一个韵部，更不能拘于一个小韵。这种理解也只有根据《广韵》才能得到。假定随使用今天的音（例如北京音）去看，“侍”的韵母是i，“待”的韵母是ai，这样的对照关系，是难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是《广韵》以后语音又有演变，所以差得更远。总结一句话，上古谐声字的准确注音，凭上古各种语音素材不能说明清楚，也不能靠现代方音解决，而必须利用《广

韵》作为楷梯进一步往上推论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必须指出，韵书表音的性质和韵文谐声字等等不同。韵书实际上就是把大量汉字按照反切的同异分类编排的字音总集，韵书是直接为反映语音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而编写的。汉魏以前没有韵书，因此研究上古音的声、韵、调系统缺乏音理根据，《切韵》一书的出现于语音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汉语音韵研究能单独成为一门学科。前人把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学问统称为音韵学。在音韵学之内，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再分为：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前人把上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称为“古音”，把唐宋时代（即《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语音时代）的语音称为“今音”，把研究上古音的学问称为古音学，把研究中古时代语音的学问称为今音学，把研究韵图和等韵理论的学问称为等韵学，而音韵学的三个部分都不能离开《广韵》。今音学主要是通过《广韵》一系韵书探究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古音学要通过《广韵》作为上推古音的阶梯，等韵学的产生是以《切韵》和《广韵》为其原始基础。等韵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古时期出现的等韵图，就韵书和韵图的关系来说，韵书是韵图的根据，韵图是为表现韵书而制作的，我们要了解等韵学的内容，必须首先弄通韵书的组织。韵图是以图表的格式来阐明韵书中反切所表示的字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韵图是韵书的辅助读物，《韵镜》《七音略》实际上就是《广韵》《切韵》一系韵书的音节图解。总而言之，过去汉语音韵学的三个分科即所谓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研究每一个分科都离不开《广韵》，《广韵》确实是古代汉语语音学入门的首要书籍。

第二节 《广韵》和汉字的历史注音

一、《广韵》以前的汉字注音

汉魏六朝以前，汉字注音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但不

论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方法，都与《广韵》有关，下面我们就不同的阶段来谈谈利用《广韵》的方法。

第一个阶段是秦汉以前谐声字的注音，集中表现在《说文解字》的形声字当中，每个字的谐声偏旁即表示产生那个字的时候的读音。例如“江”，上古从“工”得声，因此上古的“江”与“工”是音同或音近。由于方音不同，谐声字产生的时代也有先后，有许多字尽管采用的偏旁是一样，而实际读音多少有些差别，甚至有少数的字差别相当大。语音的发展和文字不免脱节。我们要了解谐声偏旁的音，只有把各种偏旁系统的字分类归纳起来，利用《广韵》的反切去认识每个偏旁系统所代表的音韵范围，而不能认为一个偏旁只有一个标准读音。如“桐从同声”，“台从目声”。从“同”得声，可以有“桐”，《广韵》徒红切，上古音[d'ouŋ]；可以有“洞”，《广韵》他红切，上古音[t'ouŋ]；从“目”得声，可以有“莒”，《广韵》羊已切，上古音[d'jə]，可以有“台”，《广韵》土来切，上古音[t'u]。这种方法，上一节已经谈过了。

利用《广韵》查考上古谐声字和谐声偏旁的关系，比较明显的有如下几种情况：

①谐声字和谐声偏旁完全同音，例如《说文》：箱，从相得声。《广韵》“箱”与“相”皆为阳部息良切，中古音[siaŋ]。

②谐声字和谐声偏旁的音相近。例如《说文》：箭，从前得声。《广韵》：箭，線部子贱切[tsien]；前，先部昨先切[dz'ien]。

③谐声字和谐声偏旁是阴声韵和入声韵的对应。例如《说文》：箫，肃声。《广韵》：箫，萧部苏彫切[sieu]；肃，屋部息逐切[sɿok]。又如《说文》：特，寺声。《广韵》：特，德部徒得切[d'ək]；寺，志部祥吏切[zɿə]。

④谐声字和谐声偏旁是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对应。例如《说文》：辉，军声。《广韵》：辉，魂部户昆切混部胡本切，这是

古读。可是《广韵》还有微部许归切[həi]，而军，文部举云切[kʲən]，-əi和-ən是阴阳对转。

更为突出的是“等”字，《说文》没有说明它是从寺得声，而《广韵》却有多肯切[təŋ]与多改切[tɔi]两读，这也是阴阳对转。《广韵》保存了古读，同时又是隋唐时代方言读音的反映。

⑤谐声字与谐声偏旁原来是同音而后来却发展为不同音。例如“江”，上古是属于东部[-oŋ]，而中古却分化为江部[-oŋ]，近古以后更进一步演变为[-aŋ]。谐声偏旁“工”从上古到现代都是[-oŋ]。

⑥谐声字与谐声偏旁原来就差别较大，如《说文》：節，即声。《广韵》：節，屑部子结切[tsiet]；即，职部子力切[tsʲək]。《广韵》从即得声的字既有收-k，也有收-t。这说明造字的时代就有方音的差异。

总而言之，谐声字本身不能表现音素方面的差别，要准确地分析谐声字的读音，还必须借助《广韵》。

第二个阶段是汉代的注音，所谓“读如”、“读若”、“读近”、“直音”等等。汉代可说是文字学和训诂学兴旺发达的时期，这时产生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文字训诂方面的专著以及古籍上的种种训释和注解，即过去所谓“音训”的材料，可是魏晋以前还没有出现音韵学的专著，对于字音的注释，只是依附于文字训诂之中，这种注音的性质比较特殊，我们有认识的必要。它是一种说明语音演变的注音，和后来的韵书字典的固定注音是不相同的。它是遇到有关语音演变或语义演变的地方才注的，并不是为初学识字或为规定读音而注的。我们常常看到所注的字有许多是极其普通的字，就是这个道理。字虽普通而音义有了问题，所以要注。这种注音是带有释义的性质。我们对于这种注音，主要是要了解它和所注的音韵对照关系，而不能认为所注的音就是那个字的固定读音。这种了解也只能利用《广韵》才能得到。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① “闕”，读近“鸿”，缓气言之。（《吕氏春秋·慎行》

“崔杼之子相与私闕。”高诱注）

② “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礼记·儒行》“竟信其志。”郑玄注）

③ “示”，读如真诸河干之“真”。真，置也，物而在掌中易为知力者也。（《礼记·中庸》“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郑玄注）

④ “茅”音“苗”。（《易·泰》“拔茅茹。”郑玄注音）

“闕，读近鸿”这个例子，照今天北京音讲，“闕”“鸿”都是hōng，似乎没有问题。但翻开《广韵》一看，“闕”是江部去声[ɣoŋ]，“鸿”是东部平声[ɣoŋ]，韵母是不同的，但“闕”字又兼有东部去声的音[ɣoŋ]。这由于东江两部的字在先秦本来是同一韵母[—oŋ]，到后来才分化开来。大概在汉代有些方音已经有这种分化的迹象，而有些方音还没有分化。这两部的音很容易相混，所以到后来有些字还兼有东江两部的音，像“闕”字“控”字等等，都并见于《广韵》东江两部去声。高诱所谓“闕读近鸿”，正是表示《吕氏春秋》这个“闕”字不能用某些方音的变音去读，还应该用东部的音去读。

“信读如伸”，现在北京音信音xìn，伸音shēn。《广韵》：

“信，震部息晋切；伸，真部矢人切。”两字声调不同，声母也不同，“信”与“伸”是音近假借，因此郑玄特别注明假借字“信”的本字是“伸”。“信读如伸”，既是注音，也是释义，意思是说“信”的音义都应该是“伸”。

“示读如真”，现在北京音示音shì，真音zhì。《广韵》：

“示，至部神至切；真，真部支义切。”两字不同音。“示读如真诸河干之真”，这就表明“示”字在这里应该按照“真”字的读音来读，依照“真”字的意义来解释。这里的“示”字之所以必须读如“真”字，原因就是古人假借“示”字当作“真”字来用，如果照“示”字的音义直读直解，就不能弄清楚这句话的原

意。

“茅音苗”，拿现在北京音看，茅是mau，苗是miao，怎么会同音呢？这也可以拿《广韵》来研究一下。“茅”在《广韵》是所谓“效摄”二等的肴韵〔—au〕，“苗”在“效摄”三等的宵韵〔—ieu〕，音比较相近，容易互相转变。前元音的a常常会引出一个i介音，也改变了主要元音，所以mau可以变为mieu。《广韵》里面和“茅”字同一个小韵的“猫”字就有mau，mieu两个音。这就比较可以理解了。再往上推，根据我们对于上古音的研究，“茅”（幽部）和“苗”（宵部）在上古也本来不同韵母。“茅”的元音本近于《广韵》的幽部，而“茅”韵的字向“苗”的转化，也是很早就有的现象。郑玄所谓“茅音苗”，正是说明周易里这个茅字应该当作苗字去理解，也应该照汉末人说的“苗”字那个音去读。说“茅音苗”，等于说“茅者苗也”。这些注音都是有训诂的意味。就是说在某种文献里某个字的词意和读音都有了问题，所以才注。同样的字在其他文献里也许没有问题，就不必一定要注。不然的话，像“茅”字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字，还有不认识的吗？我们对汉代人的注音，要多用这种眼光去看，也只有利用《广韵》做我们的线索。不然也无法了解。

当然，汉代的读若和直音也有的是单纯为注音服务的，而不一定与训诂有必然的联系，如《易·晋卦》：“晋如摧如”，郑玄注：“摧读如‘南山崔崔’之崔”。《广韵》“摧”“崔”皆为灰部昨回切。又如《说文》玉部璫字注曰：“璫，读若葱。”《广韵》“璫”“葱”皆为东部仓红切。“崔”和“摧”，“葱”和“璫”，声母韵母声调皆相同，“崔”字和“葱”字较为常见，所以用它们来比况“摧”和“璫”的读音。最明显的是《说文》“森，读若曾参之参。”《广韵》“森”“参”皆为侵部所今切。这就是以众所周知的曾参的名字比较说明“森”的读音。虽然依旧带有训诂的形式，可是“参”和“森”在意义上并无直接联系，“参”的作用主要是注音。